

徐晓望 著

21世纪的文化使命

THE CULTURAL MISSION FOR 21ST CENTURY

海风出版社
HAI FENG PUBLISHING HOUSE

21世纪的文化使命

徐晓望 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世纪的文化使命/徐晓望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80597-878-9

I .2… II .徐…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0111号

21世纪的文化使命

徐晓望 著

责任编辑: 张传桂 刘 克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福州千帆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28 1/16

印 张: 14.5印张

字 数: 237千字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7-878-9/Z · 172

定 价: 36.00元

目 录

第一编文化史宏论

21世纪的学术使命	001
汤因比的儒学观及和谐世界的构建	006
论21世纪汉民族的文化使命	021
论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	031
文化传统与文化更新	037
论21世纪世界大文化浪潮中的东方文化	045
2000年汉民族国际学术会议侧记	056

第二编海洋文化综论

黑格尔海洋文化理论批判	071
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083
妈祖信仰与中国海洋文化精神	095
华人的妈祖信仰与环南海经济圈	107
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四百年的启迪	118
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征	126

第三编区域文化概论

论齐鲁文化与汉文化的奠基	142
论巴蜀文化与汉文化在西南的传播	149
论河洛文化南传与闽文化的崛起	161
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	171
论中华文化与闽台文化	187
论科举制度与中国东南文化的开发	197
论儒家价值观与东南亚华人社会	208
寻来曲径入林幽	216

第一编：文化史宏论

21世纪的学术使命

忧国忧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但绝对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专利。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预言21世纪世界的冲突，将主要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儒教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深谙哀兵动人的道理，他将西方文明打扮成受威胁可怜的小女孩，将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诋毁成威胁西方文明的异类势力，从而号召西方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抵御来自东方的文化入侵。

如果光看这一段文字，会以为美国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它有理由对自己的安全与前途抱有忧虑。然而事实是：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动不动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当美国“如日中天”之际，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提出了“捍卫西方文明，抵御东方入侵”的口号，反映在亨廷顿身上的，正是西方式的“忧国忧民”——西方知识分子捍卫自身文化的自觉性，不能不让人佩服。

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上，并不是东方文明威胁了西方文明的存在，而是西方文明将其商品交换为核心的价值观推销到全世界，一切古老的文明都在这一价值观的冲击下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震荡，印第安文明衰落，非洲文明重振乏力，惟有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激荡中成长，成为抵御西方价值观的防波堤。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只有摧毁这最后二道防波堤，才会有西方文明的彻底胜利。亨廷顿的要害在于：他将西方文化向东方的侵略合理化——将侵略变为自卫的正义，从而进行更有“理”的侵略。

亨廷顿理论的问世，意味着西方人完成向东方文化宣战的理论准备。欧美诸

国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策划一系列针对东方的阴谋，不论是东南亚金融事件还是肢解中国计划的提出，其背后都有“文明冲突论”的投影。

当西方世界武装到牙齿摆出大战东方文明架势的时候，东方学者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近100年来，中国文化界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当我们仅仅略有成绩时，西方的“老师”再一次将东方的“学生”当作对手，从而使中国的学者迷惑不解——这1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他们从来没有向西方扩张的意识，而只是为中国的生存做一份应有的努力。根本没有做好迎战西方的文化理论准备。

从1900年起，100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使命主要是救国！这响当当的口号的提出，是因为在这一世纪之初，中华民族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亡国亡种的危险。当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的时候，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华北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不投入到当前的革命中去，“华北虽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抗战正式爆发前，北京的学界流传着的这句话，是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在这一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生。他们的业绩永远让人敬佩。

共和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的反华包围圈以及世界革命的风云，使新中国处在激荡的风波中。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在变革的风潮中，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随着时代的洪流前进。这一时代的知识界处在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在中国的普及，普遍提高了中国知识界的理论水平，但在另一面，国学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代被忽略，乾嘉学派扎实的考证功夫，被认为是脱离时代的繁琐考证，总想对时代发生重大影响的急就章，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写作的风气。于是，我们有了“以论带史”的“学术研究”。迨至“文化大革命”，被踏在地上再踩上一脚的“臭老九”更无法进行他们的专业。那一时代的文字大都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成为不堪回首的废纸。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知识界出现了新气象。然而，严冬之后，百废待兴。中国知识界不仅要扫荡“牛鬼蛇神”的寒流中苏醒过来，更需要克服极左思潮的影响，拨乱反正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事实上，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仍然是救国，应当说，在邓小平理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他们杰出地完成了这一时代的使命，于是，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即使在学术界，也出现了新时代的繁荣。

实事求是地说，历尽波折的中国的学术在世纪末的繁荣，只是一种“小康”局面，尽管我们的出版社无时不在推出一部又一部的学术著作，但海外的朋友告诉我：其中真正可看的极少。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传统的国学在本世纪初的战乱中，已是凋零废败，其中虽然有个别读书种子，但几度政治风波之后，斯人老矣。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旧的国学功底，对大多数人而言，乾嘉之风已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其二，中国学术脱离世界学术界太久，对于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思维，我们懂得太少，或者说忘得太久。以人类学方法来说，近百年来，人类学方法对学术界的渗透，已是一股潮流。我国学术界纳入人类学方法，以费孝通、傅衣凌为代表，早在30年代既有初始的成就。然而，在80年代，国内坚持人类学方法的，只有个别学人。大多数人将人类学当作一门陌生的科学。而在海外学术界，人类学几乎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功，它完成了对学术界彻底的渗透，成为学术界对话的基础。人类学方法，其实并不神秘，它与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方法”有相通之处。对于人类学研究来说，一切学问都必须走出书斋，深入社会进行调查，人类学强调：没有深入的社会调查，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就没有学问！这种扎实的学术研究风格，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对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继承传统的国学与引进海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但需要至少一二十年的过渡。在完成这一切基础工作之前，中国学术的地位，只是一个空话——如果我们将中国学术定位在诺贝尔级别。因此，在本世纪最后20年，我们所做的工作仍是“救国”的延续——挽救我们的学术！

正如救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是重建中国的学术，这不仅是中国在世界文化史地位相衬的任务，而且还是未来中国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何况，在这一时代，我们还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界越来越严厉的挑战！

当西方世界宣布他们是自由世界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近200年来，是白色人种统治着这个世界，由于这一统治，才使他们获得世界上最大多数的财富，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消耗世界2/3能源之上的。于是，他们惊恐地注视东方世界的发展，深怕东方的发展，会导致世界另一个文明中心的出现，从而摧毁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使他们再也不可能占有世界2/3的

能源。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其实反映了西方人的战略思考。而索罗斯等西方金融家策动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对东方的一次打击。除此之外，西方国家还筹划了分裂中国的阴谋，并逐步将它付诸实践。

西方分裂中国的战略，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还是文化上的。西方人对东方的文化研究，越来越显示出他们的战略目的，例如，在中国南方文化研究方面，他们着力证明的是：长江以南的民众其实不是中国人，他们在血缘上、习俗上都与中国北方有差异。虽说这些差异其实是很小的，但他们只要找到差异，便认为他们找到了南方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的证据。这类研究背后的潜台词很明确——中国应当分裂。当然，问题不在于他们怎样自说自话，而在于他们利用学术上的优势地位，向中国学者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千方百计让中国学者接受他们的观念。再通过知识分子影响全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普遍地接受了这一观念，那么中国未来的前途肯定是走向分裂！在历史上，分裂的中国一直是战乱的中国，而战乱的中国是不可能真正发展的，倘若这一情况出现，中国便不会成为西方人的对手。

西方的战略如此明白无误，而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使命其实也很明确了——在21世纪，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不仅要重振国学，而且要在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学术价值系统，以对抗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因此，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使命是在20世纪“救国”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奋斗。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西方文化的入侵点，都要有我们自己的回应。这不仅是以中国的影像产品，抵御像潮水一般涌入的西方文化产品，而且还要有我们具有民族特色，同时又有世界水准的学术研究，去和贯穿西方价值观的学术研究争衡。没有民族特色，我们将在世界的文化浪潮中失去自我，没有世界水准，我们的研究根本无法在世界上立足。如果说学术研究的世界水准，这是容易理解的，关于民族特色，我们尤其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当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价值传统，真正做到振兴东方文化。目前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基本是以西方学术价值观念为参照系统，来判断东方学术观的价值，这种研究，有其表面上的繁荣，其实无法使东方学术真正地站立起来。在21世纪我们所要做的是：建立东方价值观完整的学术系统，这才能使东方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永远保持自己的特色。

但是，在进入新千年的时候，东方与西方并不是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西

方有其强大的财力作为依托，有其一贯的文化霸权在知识界的影响，仅仅一个邀请出国访问，便使许多东方国家的学者不能不仰其鼻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学者所做的研究，其实是为西方基金会所出的题目填空，为了能使老板满意，他们的结论也不得不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重振东方文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可能需要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也许还要更长一些。至于中国的学者，其中多数人还在面临的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徘徊，为自己的地位而迷惑，为眼前的油盐柴米问题操心，为职称的评定不得不去写应景的论文与著作，琐事浪费了大多数人的精力。但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觉醒过来，在为眼前事情操心的时候，也想一想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命运。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为东方学术价值观的重建出一点成果，积铢累寸，奠定未来一代人冲击世界高峰的基础。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即使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庞大的，如果大家都能做一点，每年每月坚持下去，我们应当能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为捍卫中国的文化而奋斗吧！

（《福建日报》2000年2月4日）

汤因比的儒学观及和谐世界的构建

当今世界纷争不已，战乱频发。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缠斗至今看不到解决希望。要拯救这个混乱的世界，必须依靠古老的儒学智慧，让儒家“和而不同”的理想成为新的国际准则，达到儒家“协和万邦”的理想境界。

一、汤因比对儒学价值观的希望

在1972——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学会倡导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漫长的谈话，谈话的主题是展望21世纪社会。1972年的中国正处在文化革命中，是一个贫穷而又落后的大国，但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二位却对中国寄予无限的希望，汤因比说：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上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①

即使在中国日益强大繁荣的今天看汤因比这段话，许多中国人仍然对汤因比这段话感到莫名其妙，作为西方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汤因比不是将统一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伟大”的美国，却寄希望于刚从孤立中走出来的中国？这是因为：当时正是全世界人民反对越南战争的高潮时期，作为第一流史学家，汤因比对越南战争的解读使他看到西方崇拜武力的文化因子是世界动荡的根源，因而，他寄希望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因素引导人类脱离战争的苦海。汤因比又说：

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

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②

从物质方面说，就是现在中国和西欧各国、苏联、日本等相比，也不比过去受屈辱的那个世纪强大多少。虽然如此，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③

中国人看到汤因比理想，一定会感慨不已。儒学在中国一度被当作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次规模巨大的文化大批判，儒学在中国的根基几乎被铲除。但在海外，却有一些世界级的大师，认为儒学中含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未来的世界要靠儒学来拯救。这一巨大的反差，使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重新评价汤因比寄托希望的儒学。

美国未来学家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可以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美欧为代表的基督文化圈、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伊斯兰文化圈、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他认为：21世纪将是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联合起来与基督文化圈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亨廷顿的观点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争议。然而，美国遭到9.11恐怖大袭击之后，为了还击恐怖主义，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曾有人以为：这意味着亨廷顿预言的实现。但是，东方的儒教国家并未卷入这两场战争中去。世界上越来越激烈的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我认为：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是历史问题的延续，也是其宗教本质所决定的。是宗教决定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征服世界的欲望，这样的两种宗教遇到一起，一定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事实上，近1300多年来，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是基督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冲突。而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一向以“协和万邦”为其传统。在历史上，儒教有闭关自守的倾向，但向外扩张并非儒教的传统。所以，未来世界仍将维持这一格局——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将愈演愈烈，而以儒学为其指导的中国在内以国家建设为主，在外努力协调国际间的矛盾。世界问题的最后解决，有赖于儒家思想的传播。

二、从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看汤因比的失望

基督教的文化性格与东方宗教有很大不同。东方宗教往往是和平的、内敛

的，以超越尘世为宗教的最终目的。所以，在东方宗教的影响下，人的性格会归于和平，视战争为最大罪恶。但基督教不同，《路加福音》写道：“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么？……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战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④它将这种斗争哲学发挥到极致，就形成了一个好斗的宗教。所以，基督教不管它传播到何处，不管其力量如何微小，只要它存在它都要和异性宗教进行斗争。它把和其他宗教并存看作是基督教的灭亡。为了给基督教开辟道路，不惜采用战争等极端的手段。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传播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爱拉斯谟揭露：“基督教教会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的，依靠血而壮大的……现在他们用刀剑来继续行善……战争是可怕的，它适于野兽而不适于人类……战争是邪恶的，它与基督毫无共同之处。然而我们的教皇疏忽一切，而专门致力于战争。这些疲倦的老人们，不顾一切的劳力与费用，精力充沛地干起来，其目的只是在于颠覆法律、宗教、和平与人道制度。”然而，基督教就是在火与血的历史里得到发展。基督教形成于2000年前，最早诞生于犹太人。而后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传播。它最早是下层社会民众自救的团体组织，曾经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但随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改信基督教，基督教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此后，基督徒凭借国家的力量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传播。于是，北非国家、欧洲南部国家以及亚洲的东部国家陆续成为基督教文化圈。当时的基督徒以宣扬基督教为其口号，发动了对北欧及东欧的战争。随着圣战的进行，欧洲大部民族都改宗基督教。在非洲，南至埃塞俄比亚，北至埃及、西至突尼斯，都是基督教传播区域。在亚洲，中东的希腊化国家都信仰基督教。其后，基督教甚至随着游牧民族的迁徙步伐传到中国北方草原，蒙古族内部也部分人成为基督教信仰者。总之，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基督教处在鼎盛时代。

然而，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崛起，开始压缩基督教的空间。伊斯兰教兴起于公元610年，其开创者穆罕默德最终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的教义吸收了基督教的许多成份，也有与基督教相同的文化性格。穆罕默德与他的后继者以武力为基础向外部世界传教，在征服阿拉伯地区的基础上建

立了倭马亚王朝。随着阿拉伯的弯刀闪耀，阿拉伯帝国的疆土不断扩展。公元664年，帝国东疆已经扩张到阿富汗的喀布尔，670年，西非的突尼斯已经成为帝国的疆土。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强大影响，北非的基督教国家，除了埃塞俄比亚人，都改宗伊斯兰教，而在亚洲，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范围内，原来信奉基督教的部落纷纷改宗伊斯兰教，这使基督教受到极大压制。迄今为止，在西亚与中亚，除了原隶属于苏联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只有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中有一部分信奉基督教，其他人都改信伊斯兰教。可见，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发展，大大压缩了基督教的空间。其后，阿拉伯人还渡海向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扩张，一度将西班牙的大部领土纳入辖下。在东方，阿拉伯人也曾向草原地带扩张，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早在8世纪就被阿拉伯人征服。继倭马亚王朝之后出现的另一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将阿拉伯帝国扩张到极点，地中海南岸、西岸、东岸的多数国家都接受了伊斯兰教。其后，阿拔斯王朝因地域过于辽阔而分裂，但伊斯兰教对这一大片领土的统治已然巩固。中亚原来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大都成为伊斯兰教的信仰者。

伊斯兰教的发展也对佛教产生了很大影响。中亚一带原有很多信奉佛教的国家，后来都变成了伊斯兰教国家。当然，历史的发展也有其波折，迄至十三世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受到蒙古骑兵的打击，阿拔斯王朝的残余被信奉佛教的蒙古人扫荡。然而，在西亚建立的蒙古伊儿汗国很快改宗伊斯兰教。由于伊儿汗国的影响，中国的新疆地带逐渐成为伊斯兰教徒的活动区域。因此，尽管西亚与中亚的伊斯兰国家各有兴废，但伊斯兰教的势力仍在发展。

在伊斯兰国家的压力下，西欧基督教国家也曾发动多次反击。早在阿拔斯王朝攻陷巴勒斯坦之后，罗马教廷震惊于基督圣墓的沦陷，开始呼唤十字军东征。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出发奔向东方，他们的核心由来自法国、英国、神圣罗马帝国骑士们组成。这支十字军直奔巴勒斯坦，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后在杀死异教徒的口号下进行大屠杀，有7万以上的穆斯林被杀，全城金银财宝都被扫荡一空。十字军战士此后在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南部建立了信仰基督教的骑士国家，以耶路撒冷国为核心，另建安条克、的黎波里和爱德沙等小国，拱卫耶路撒冷。然而，十字军在东方的扩张很快受到穆斯林的反击。1187年，来自埃及的萨拉丁攻克了耶路撒冷。为了夺回圣地，教皇又组织了多次十字军东征，分别侵略耶路撒冷、埃及等地，但都无结果而告终。

欧洲骑士留在西亚的小国都被穆斯林消灭。1291年，十字军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十字军运动以失败而结束。其后，欧洲自己面临蒙古大军的入侵，东欧许多国家被蒙古灭亡，西欧国家无暇东顾。

当蒙古人的第一波扩张浪潮过去之后，西亚的小亚细亚半岛兴起了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的建造者原为来自中国西北部的突厥人，他们在蒙古人的压力下离开家园东迁，公元1000年左右，他们来到西亚的锡尔河畔，在这里接受了伊斯兰教，建立政教合一的制度。1326年，突厥人的一个首领奥斯曼定都于小亚细亚的布鲁萨城，逐步发展为可与拜占庭抗衡的大国。史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进入欧洲的巴尔干半岛。1371年，土耳其大军击败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瓦拉几亚、匈牙利的联军，从此建立了巴尔干霸权，并陆续吞并巴尔干半岛的塞维利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希腊也落入土耳其的掌心之中。1402年，奥斯曼帝国与蒙古人的帖木儿帝国之间发生了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会战，失利后，奥斯曼帝国并未消沉。当蒙古帝国一个接一个崩溃后，奥斯曼帝国取而代之，成为西亚的霸主。1453年，土耳其大军攻克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在城内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大屠杀。君士坦丁堡原为基督教中东正教大主教所在地，而拜占庭是古罗马帝国的东部首都，因此，君士坦丁堡被攻克，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大挫折，同时，它也被视为伊斯兰教的一大胜利。其后，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向欧洲腹地进攻，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大军曾经多次攻打奥地利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整个西欧一度在奥斯曼帝国的脚下擅抖。至今巴尔干半岛仍有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黑山、波斯尼亚等国，这都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东欧留下的文化遗产。挟战胜之余威，奥斯曼帝国也发动了对穆斯林区域的征服，中东各国陆续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在苏丹苏里曼的统治时期（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处于鼎盛阶段，西至匈牙利边境，北到中亚的阿塞拜疆，南到非洲的埃及，东到伊朗边境，都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除了奥斯曼帝国之外，当时的伊朗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不仅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对手，17世纪初还北上中亚，吞并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成为一个在亚洲拥有巨大影响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境内的莫卧儿帝国始建于1526年，经过多次战争，莫卧儿帝国最终领有印度的大部。1600年前后，莫卧儿帝国进入鼎盛阶段，称雄于南部亚洲。以上信奉伊斯兰教

的三大帝国的并列，对欧洲诸国是极大的威慑。其时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境内都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土王，在历史上，这是伊斯兰国家势力最盛的阶段。

从十六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欧洲西部有极大的发展，荷兰、英国、法国相继成为具有实力的大国，而俄罗斯在北方的兴起，也使基督教国家的力量大增。基督教国家的力量还来自于对美洲与世界的征服。自15世纪开始，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开始了环球航线的探险，征服美洲之后，西班牙人发现了世界特大银矿与金矿，从此，欧洲人不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乞儿，源源不断的金银流入使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区域。国力的强盛，也使欧洲人在战争中屡屡获胜。先是，1509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击败土耳其、阿拉伯与印度人的联合舰队，建立了印度洋霸权；1571年，西班牙与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在地中海大败土耳其海军，从此，伊斯兰教国家的势力在海上消退。1683年，进攻维也纳的土耳其军队被波兰、萨克森联军击败，其后，奥地利、波兰、萨克森、俄罗斯联军与土耳其之间进行了十五年战争，奥斯曼帝国最后割土求和。18世纪，俄罗斯展开针对土耳其的侵略战争，以火枪武装起来的哥萨克骑兵屡屡击败奥斯曼帝国的大军，一块一块地蚕食土耳其的北方部分。不久，伊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北方疆土一块又一块被俄罗斯蚕食。信奉东正教的哥萨克骑兵以大炮、火枪为武器，多次击败武器落后的伊斯兰士兵。与俄罗斯共同向东方发起战争的是奥地利、匈牙利联合帝国，奥匈帝国侵吞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疆土，巴尔干国家一个又一个落入奥匈帝国的巨掌。此外，荷兰与英国世界帝国的崛起，更是对伊斯兰教势力的重大打击。英国征服了印度，将莫卧儿帝国诸王公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荷兰将印度尼西亚当作自己的殖民地。伊朗在俄罗斯的蚕食下丧失了许多北方领土。迄至十九世纪，世界发生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力根本性的转化，基督教国家势力日益强大，伊斯兰教势力逐渐衰退，奥斯曼帝国、伊朗、莫卧儿帝国的本土都遭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巴尔干国家陆续走向独立。在20世纪前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土耳其被迫放弃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而阿拉伯国家也四分五裂，成立了数十个国家，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强国，大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西欧控制。为了进一步控制阿拉伯国家，英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制造了以色列国，今天的以色列国，真正成为阿拉伯人的梦魇；其次，为了控制印度半岛，英国人在撤离印度时，将印度分裂为巴

基斯坦、印度二个国家，二国之间征战不已，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屡屡战败。此外，伊朗的国力有限，一直无法对西方世界产生较大的威胁。因此，从大历史来看，自十七世纪以后，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国家的胜利使之扭转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过去基督教世界是受侵略的，其后，基督教国家成了侵略者，而且，基督教国家在与伊斯兰国家征战中，逐步建立了世界性的霸权。

从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的长期关系来看，二者之间的历史纠缠不清，而且呈现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趋势。今天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与伊朗的矛盾，其实质是历史上二大系列国家之间战争的延续。因此，美国总统布什有一次得意洋洋地说，他所发动的侵略伊拉克战争是十字军远征，这反映了欧美国家真实的心态，也受到伊斯兰国家的批评。从历史发展的大势看，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很难消除，伊斯兰国家虽然屡屡受挫，仍然拥有很大的潜力，从西部非洲的突尼斯到亚洲东部的印度尼西亚，亚非欧三大洲有几十个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因而，不论什么国际会议召开，伊斯兰国家都有庞大的阵营。其次，伊斯兰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人口都在一亿人上下，中东诸国的总人口也不少。世界上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共达七亿以上。任何国家都不可忽视七亿人的力量。再次，伊斯兰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占有世界上可输出石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此外，北非的利比亚及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也是世界著名的产油国。目前，国际市场上的油价已经翻了几翻，一桶石油的价格达到70美元以上，产油国的收入大增。这一油价若能维持几年，伊斯兰国家的财力将大幅度增长。那时候，伊斯兰国家在国际政治上的发言权将更大。目前，美国正准备着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一旦打响，世界上石油的价格将上涨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届时伊斯兰国家的力量将更为强大。所以说，美国想通过武力来征服伊斯兰世界，根本是妄想。正是美国对中东的战争，大大加强了伊斯兰国家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必将为这一失策付出代价。

伊斯兰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业国，甚至没有一个后备的工业国。即使是马来西亚这样工业发展较快的亚洲四小虎之一，其工业主要掌握在外商手中，而不是穆斯林手中，怎样将伊斯兰的世俗制度与工业社会相联合，发展符合时代潮流的工业化大国，这将是伊斯兰国家应当考虑的课

题，否则，还将长期受西方国家的压迫。毫无疑问，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伊斯兰国家与基督教国家的争斗还将继续下去，这将是21世纪发展的一条主线。

三、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不断的内在原因

从历史经验来看，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斗争，历来以战争为其主线。二教之间从未有过长时期的和平，大都处在一场又一场的连续战争中。和平只是战争的准备期，或者是敌对双方疲倦的结果。即使是在今天的世界上，美国霸权已经建立，但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而是不断产生了新的战争。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核时代，任何大规模的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人类世界的毁灭。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国家与中东国家的冲突，其潜在的危险性令人不寒而栗。现代的西方国家掌握了绝对优势的核武器与世界霸权，而伊斯兰国家力争突破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建立自己的核武库，尽管西方国家对激进的伊斯兰国家进行核封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斯兰国家掌握核武器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届时，西方国家与伊斯兰激进国家的冲突，很可能引发一场核大战。这就是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感到担心的原因。

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尖锐的冲突有其内在的文化原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爱好和平的一面，也都有爱护同教兄弟的一面。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以其《交友论》震动儒学界。其原因在于：他发挥了儒学的思想。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他同时又说，仁爱要由近及远，首先从自己的家人做起，然后做到宗族之间的仁爱，进而达到同乡同国人之间的仁爱，最后才达到天下所有人都仁爱的新境界。但利玛窦的《交友论》主张超越血统的仁爱，他认为，天下之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都应当以兄弟姐妹相称相爱，血缘的远近是次要的。这一口号实际上符合儒者“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原则。因而，利玛窦的《交友论》引起儒学界的轰动，使儒者以为远在大西洋的基督教教义与儒学近似，为利玛窦传播基督教开拓了市场。

但基督教的仁爱超越了血统，并未超越宗教。就基督教的本意而言，它只是将教内同仁视为兄弟，但教外的人并不是他们的兄弟。基督徒评价外人，首先看他是否信仰上帝，他们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具备做好人的基础。一些极端分子因而推论：不信上帝的人，就不是好人。早期基督教中流传一个口